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陈琳 著

翻译学 文化转向的研究

Toward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06A077)成果

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十一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成果

湘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十一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成果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翻译学文化转向的研究

Toward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陈琳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学文化转向的研究 / 陈琳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5438-5233-4

I. 翻... II. 陈... III. 翻译理论-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7587 号

责任编辑: 梁 超

装帧设计: 杨东平

翻译学文化转向的研究

陈 琳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 410005)

(营销部电话: 0731-2226732)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神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02000

ISBN 978-7-5438-5233-4

定价: 26.00 元

序

1990年，翻译研究学派代表人物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翻译研究“文化的转向”，由此开始了翻译研究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并最终形成了西方翻译理论领域的另一新的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其基本思想是：翻译研究实际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把翻译视为文化转换而非单纯的语际转换、把翻译视为交际行为而非符码转换行为，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从文化研究角度研究翻译意味着将语言学的研究和文化的人文阐释及翻译行为的个案分析相结合，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对翻译学这一新兴的尚不成熟的边缘学科的理论建构。

1997年，他们又合作出版了《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梳理了文化研究与翻译学在过去的30年中平行发展的三个阶段：以奈达和纽马克为代表的文化主义者阶段（a culturalist phase）、以伊文-佐哈和图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阶段以及以赛蒙和妮兰贾娜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阶段。文化研究借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而进入了一个新国际主义阶段（a new internationalist phase）。如德曼将翻译隐喻为离乡背

并的流放者。翻译是“将原文移动并将它去经典化，使其处于分裂化的运行中，离经叛道地漫游并最终成为永远客居他乡的流放者”。因此，译文成为实现文化转换的真实存在而非虚拟存在。翻译分裂性、游离性和流放性的文化身份定义了文化研究的新国际主义阶段。

文化研究探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内涵的解码和编码，即研究文化碎片的存活、文化游离的发生以及流放的文本是怎样被目的语文化所接受的。因此，文化研究和翻译学这两个学科跳出各自轨道，实现了跨学科的交叉发展。文化研究日益关注权力关系以及和文本生成之间的关系。翻译学重新定义翻译研究的对象。所研究的不是单纯的文本，而是一个处于由文学和超文学现象组成的一个网络中的言语文本，且这个网络覆盖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文本处于由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中文学和超文学现象所组成的网络中，而且，研究文本的目的在于认识文化价值和文化遗产的构建过程，剖析翻译中存在的民族中心主义暴力，分析翻译对作者形象的构建以及翻译成为权力阶层的文化资本的过程。

这一新的定义赋予了翻译文化研究学派丰富的研究内容。首先是“系统”理论研究。伊文-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将目的语中的文化、文学和历史等视作一个多元系统，翻译文学是这个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决定翻译策略；描述翻译学派的代表学者图瑞提出了描写翻译学研究方法，目的在于认识翻译过程中的“规范”以及发现翻译的“通则”；彻斯特曼和赫曼斯进一步发展了“规范”概念；操控学派的代表学者兰伯特和凡·格普则将理论与翻译个案研究相结合。第二是文化研究视角的多维度研究。勒菲弗

尔提出翻译是“重写”，认为翻译受到存在于赞助人、文学诗学以及文化系统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赛蒙研究了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项目，揭示其翻译目的是彰显女性主义身份；斯皮瓦克和妮兰贾娜则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角度，认为翻译推进了殖民化进程并塑造了殖民形象。妮兰贾娜呼吁译者成为“介入者”，把翻译作为抵抗和转化殖民化的场所，因此翻译被视为是一项国际性的政治活动。第三是劳伦斯·韦努蒂提出“异化”应该成为翻译的文化和政治纲领。

这些学者深刻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中国学者对翻译文化研究学派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但是，上述学者的著述研究的翻译行为及其译例都取自各自的文化语境，因此得出的结论往往具有针对性和地域性。

本人对文化研究视阈下的翻译研究已经持续进行了十多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做博士生期间和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的主攻方向均是翻译学文化转向的研究。学习和研究得愈多愈深入，对翻译学的文化转向的困惑也愈多。特别是近年来，我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国内翻译学界关于翻译文化转向的理论，关于其研究方法，特别是关于中国本土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文化研究视阈的考察等方面均落后于国际翻译文化研究学派的发展。我认为，我们的理论必须在跟踪并反思国际理论前沿、立足本土、挖掘中英互译特性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根本性的本土研究及其创新，以认识本土翻译理论和实践以及其蕴含的文化理论意义。本书的研究就是我在这方面进行长期艰苦探索的一个结晶。探索的问题围绕前面所述的翻译文化研究学派研究的前沿课题展开。具体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紧紧抓住原文的异域性、审美的新奇性以及文化和谐

共生的时代特征，提出文化碎片的存活意味着翻译存异。即在翻译中保留异域文化异质特征的翻译审美的理论范式以及翻译标准对其的宽容性。

二、突破译者研究和文化翻译研究局限于翻译技巧的讨论，强调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文化价值取向，且这种取向决定了外国文本在目的语社会中的文化身份。译者既可以保留文本的异域文化身份，也可以重塑外国文本在本土的文化身份；强调译者对国别翻译思想的形成影响，提出译者的主体地位的哲学范式。

三、注重研究社会性别与翻译理论的关系的国别差异。基于对加拿大翻译理论发展的研究，分析了社会性别和社会政治对翻译理论特色形成的影响，同时探讨了国别译论的性别角色双重性、英汉翻译中的女性主义话语等问题。

四、注重翻译重写因素的个案研究，并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探索诗学和读者反应与译者的翻译策略、意识形态与译者主体性、意识形态对英中文学翻译的具体操控。

五、突破语用翻译的探讨局限于跨文化的文化差异和语用蕴含在翻译中的处理的讨论，而将语篇衔接、言语行为以及动态顺应等语用学理论应用于对翻译实践的阐释。

本课题的研究建立在翻译学与文化研究、翻译学与语用学、理论与实践等相结合的基础上，紧紧把握当今翻译学的发展动态，关注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前沿成果，对中国本土翻译行为作了一些艰苦而有意义的探索。这些探索尽管会有不少瑕疵，但毕竟是一项富有开创意义的工作，期望得到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

本课题的研究由陈琳主持。具体研究和写作分工如下：第

一章的第一、二、三节，陈琳；第四节，陈鹏、陈琳。第二章，陈琳；第三章的第一、二节，陈琳；第三节，陈钰、陈琳。第四章的第一、二节，蒋芬、陈琳；第三节，赵湘波、陈琳；第四、五节，罗琼、陈琳。第五章的第一、二、四、五节，陈琳；第三节，李虹、陈琳。行文校对，彭禹。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许多同行的指教，并参阅了相关专家的研究文献，从中获得许多启发和教益。本书的出版得到 2006 年度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06A077）经费的资助，同时还得到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十一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和湘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十一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目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陈琳

2008 年 4 月 6 日

目 录

第一章 翻译异域文化：存异	(1)
第一节 翻译文化研究学派实证性描述研究方法	(1)
第二节 文学翻译审美的陌生化性.....	(14)
第三节 全球化背景下翻译的异质性.....	(35)
第四节 模因权威性选择标准与存异.....	(42)
第二章 译者与翻译文化身份	(51)
第一节 翻译文化身份.....	(51)
第二节 从玄奘与圣·哲罗姆的比较看中西翻译 思想之差异.....	(63)
第三节 译者主体地位：分析哲学的阐释.....	(79)
第四节 文化翻译中语用用意翻译的研究.....	(89)
第五节 奈达和纽马克翻译理论之比较.....	(103)
第六节 奈达与纽马克的翻译交际观比较.....	(113)
第七节 翻译交际策略.....	(121)

第一章 翻译异域文化：存异

第一节 翻译文化研究学派实证性描述研究方法

姜秋霞（2005）归纳了实证性描述研究的具体方法：1. 严格的样本；2. 具体的研究设计及研究过程描述分析；3. 规范性地系统收集数据，逐项的描写与统计分析；4. 数据——系统考察——分析——结论。这确实是具有非常严格意义的理想的实证性描述性研究。其中第三步涉及的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如果理解为社会科学中的统计分析和数据分析软件 SPSS 的运用，那么翻译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确实缺乏这一技术性的分析手段。但是，我们再进一步考察实证性和描写性的定义以及在人文科学中包括翻译研究中的实际应用，我们也许能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地认识实证性描述研究在翻译文化研究学派研究中的应用。

一、实证性与描述研究性对翻译文化研究学派研究的意义

实证研究方法来源于哲学的实证主义，这种哲学派别起源于 19 世纪 30 ~ 60 年代，创始人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

德。他用“实证主义”来命名自己的哲学，其目的是想说明他的哲学不是依靠“抽象的原理”推论出来的，而是由感觉经验证实的“确实的”知识。他从感觉经验出发，把它看作一切知识的来源。他认为科学即是对经验的描述，并强调经验证实对科学的重要性，认为哲学和科学一样，其任务在于概括和描述经验，并达到实证的知识。在20世纪20~30年代发展成为新实证主义即逻辑实证主义，其理论的支持来源于休谟、密尔的经验论、马赫的实证主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学说。为了有效地判别命题是否有意义，他们提出了著名的“可实证性原则”，即具有原则上可被经验观察所证实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这种科学取向主张对所考察现象的考证和对结论的考证，它是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的结果。李承贵追溯了实证方法在我国人文学界的介绍、宣传和应用，我们从中可以理解实证法的内涵和外延（2001：65-69）。严复理解的实证方法为“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ibid：45）。所谓实证就是要把所确定的理论与事实进行验证。“三百年科学公例，所由在在见极，不可复摇者，非必理想之妙过古人也，亦以严于印证之故”（ibid：67）。梁启超也对实证法进行了理解和阐释，他认为“实证法就是对所观察现象之考证和对结论之考证”（ibid：67）。他还把史料喻为史之组织细胞，认为史料不具或不确，也就没有历史研究，因为有证之史料是史学研究之基础。他对实证研究做了一个具体的阐释：

总要积无数的经验——或照原样子继续忠实观察，或

用人为了的加减改变试验，务找出真凭实据，才能确定此事物与彼事物之关系。这还是第一步。再进一步，凡一事物之成毁，断不止一个原因，知道甲和乙的关系还不够，又要知道甲和丙、丁和乙等关系，原因之中有原因，想真知道乙和甲的关系，便须知道乙和庚、庚和辛、辛和壬等关系。不经过这些工夫，贸然下一个断案说某事物和某事物有何关系，便是武断，便是非科学。(ibid)

胡适也讨论了实证主义的特点，认为：实证主义方法可以假设，可以超越传统的研究资料范畴，由于文字资料是死的，故考证只跟材料走，虽然不能不搜集材料，却不能捏造材料。从文字的校勘以至历史的考据，都只能尊重证据却不能创造证据。因此，实证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对所观察现象的考证和对结论的考证。对现象的统计性方法固然是其特征之一，但并不是必备条件。翻译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考察对象是翻译的文化历史现象，因此很大程度上，是对翻译历史资料，包括历史译本、历史的翻译评论、译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等的考察。翻译文化研究学派所做的工作就是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证。因此，如果把统计分析或信息分析（即数据分析 SPSS 的应用）作为实证性研究的必备条件，那么，翻译文化派的研究中缺乏这一统计分析过程，它确实不能算作实证性；但如果，我们从实证主义的哲学方法论意义以及严复、梁实秋、胡适的理解，即没有将统计分析看作必备条件，那么翻译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具有实证性，即注重对翻译现象的历史和文化的客观考察，达到实证性研究的目的，即：“描述我们经验世界的特定现象和建立原则，以便能解释和预测现象。科学研究的解释和预测的原

则是通过假设的普遍性和理论来体现的；这些原则概括了普遍的规律并能解释个别现象，并能系统地预见现象的发生”（Williams et al, 2002: 60）。因此，翻译文化研究学派研究的实证性即对翻译历史文本资料的系统性收集和考察，以这些客观的实际数据描述解释特定翻译现象及其规律。描述性是实证性的结果之一。^① 刘润清定义描述性研究如下：

采取一系列方法对所要研究的现象加以界定、说明和描述，但不进行任何实验性的干涉或操纵。一般有一两个假设的出发点，然后不断缩小研究范围。收集数据的方法不外乎是观察、记录、测试、问卷、面谈、录音、录像、文献查阅等。包括历史研究、发展研究、个案研究等。（1999: 37）

因此“描述性研究不对变量进行任何干预或控制，都是描述自然发生的现象”（ibid）。其中的观察是聚焦性的。它“可以是综合性的，也可以是分析性的；既可以采用归纳法，也可以采用演绎法；既可以检查已有的假说，也可以提出假说；既可以使用定性数据，也经常使用定量数据”（ibid）。从以上可以得出，如果该研究不对变量进行控制且描述自然发生的现象，数据的收集是文献查阅，无论其方法是归纳法还是演绎法，那它就是描述性研究。它与理论研究的区别在于其客观数据的收集；与实验性研究的区别在于不对变量进行干预和控制。描述性研究就是对所要研究的对象的性质作系统而正确的

① 另一个结果是实验性研究。

描写与叙述，主要作用在于客观报道，以供了解，并进而形成一般性的推论。描述性研究应用于翻译研究，那么其定义可为：

描述性研究以客观描述为基础，对翻译现象及翻译行为进行自然的观察与分析，所描述的现象和行为必须是在自然而然的环境下产生的，不受研究者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及研究者不操纵研究背景，事先不带有任何预设，也不对研究结果提出任何制约，而是描述和分析在自然发生状态下的各种翻译现象和行为。（姜秋霞，2005）

这两个定义都说明了翻译研究的描述性的关键：即对翻译现象及翻译行为进行自然的观察与分析，不受研究者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即研究者不操纵研究背景，事先不带有任何预设，也不对研究结果提出任何制约，而是描述和分析在自然发生状态下的各种翻译现象和行为。翻译文化研究学派所分析的对象是历史的目的语文本，描述目的语文本产生的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数据具有聚焦性，研究者不对变量进行任何干预或控制，因此数据的客观性特征突出，也就是描述性特征突出。其研究体现了这种描述性研究的性质。它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查阅和对目的语文本生成的目的语社会文化特性、翻译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发挥等自然因素的客观考察，来描述规律。以上只是说明描述性具有的特征以及翻译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方法具有这些特征。但是，这种描述性是否具有实证性，就需要我们的进一步考察。姜秋霞以限定性描述和非限定性描述清楚区分了实证性描述和理论性描述。这进一步深化了对描述性的定

义。根据她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实证性描述概括为：选定范围、限定数据、系统收集、系统考察、过程论证、得出规律。而与之相对的理论性描述可以概括为：理论假设、按图索骥、随意数据、反思判断辩护。所谓按图索骥，就是在理论的指导下寻找相应的数据。我们对翻译文化研究学派的部分代表性研究进行了考察，以期发现其描述的性质。

二、翻译文化研究学派实证性描述性研究方法

我们统计性地考察了翻译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学者以及他们的代表性研究的研究方法。首先，我选择了翻译文化研究派的两位奠基学者，他们是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安德·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因为他们在翻译文化学的奠基地位和激进派地位。其次是文化翻译研究学派的发展分支——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代表研究者是谢丽·赛蒙（Sherry Simon）和路易斯·冯·福禄窠（Luise von Flotow）。

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1990年合编了《翻译、历史和文化》。导言的序言取名为“普劳斯特的祖母和《一千零一夜》：翻译中的‘文化转向’”，这是翻译学第一次宣言般地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明确提出：“语言表达文化，译者应该具备双文化，而不是双语言……翻译实践的研究也因此从形式主义方法转向对文化环境、历史和习俗的研究……比较文学是翻译学底下的一个学科而不是反之”（Bassnett et al, 1990: 11）。因此，他们俩也因此被认为开拓了翻译的文化学派。在这本书中，勒菲弗尔“实证的历史研究记录了他所列举的历史变化，并解释它们，探究在社会中权力的异常现象和无常以及在文化（翻译是文化的一部分）形成的过程中，权力意味着什么”（ibid: 5）。在1998年，两人又合著《文化构建——文学翻译

论文集》(Bassnett et al, 1998), 进一步提出, “文学(包括文学翻译)一直是与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并进一步提出文化学的翻译转向。勒菲弗尔在1992年, 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专著《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Lefevere, 1992), 提出: 翻译是文化层面上的改写。同时还出版了《翻译/历史/文化: 文论》。因此, 他们两人是文化学派的先锋。本文考察的研究方法的对象研究文本是《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翻译、历史和文化》和《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文集》。前者是勒菲弗尔的重写理论的框架, 后者是他俩的理论进展的研究成果的重要的论文汇集。因此, 这三本书中, 一本是专著, 两本是论文集, 其中九篇为他俩所分别撰写。专著《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的研究方法是实证性描写方法和理论方法的综合。九篇论文中, 其中五篇的研究方法是理论分析,^① 四篇是实证描述性研究的个案分析。^②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的研究方法是实证性描写方法和理论方法的综合。

之所以说它具有实证性描写方法, 因为它具备以下的特

① 它们是: “Translation: Its Genealogy in the West”,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When is a Translation not a Translation”, “Still Trapped in the Labyrinth: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and Theatre” and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第一篇见 Bassnett, 1990; 后四篇见巴斯奈特, 1998。

② 它们是: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Some Aeneids in English”, “Transplanting the Seed: Poetry and Translation”, “The Gates of Analogy: the Kalevala in English”, “Acculturating Bertolt Brecht”. 见勒菲弗尔, 1998。